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

林文郎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95
F729.44

1

2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

林文勋 著

XAJ54/14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11

C

190170

滇新登字 07 号

责任编辑 戴 抗

封面设计 丁群亚

责任校对 段建堂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

林文勋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1994 年 11 月 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81025-471-5 / F·62

定价：8.50 元

前 言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所以如此，原因固不只一端。但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对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80年代初，业师李埏先生首次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入手，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指出：生产和交换这两个职能部门，是社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经济曲线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经济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集中表现”；“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劝导将商品经济问题放在经济史研究的头等重要地位加以认真研究^①。在他的引导下，我选择了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为一内陆盆地。历史上，它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发展较早；二是水平较高。远在秦汉之际，成都即跻身于全国五大都市的行列，降至唐代，“扬一益二”又成了全国商业都会发展的划时代大事，入宋以后，这里竟率先出现了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些均有力地说明其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全国是处于最前列的。

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斯波义信基于对我国宋代社会商

^①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业发展的研究，将宋代国内划分为南、北、蜀三个商品流通圈^①。四川地区一方面成为与南方和北方鼎足而立的商品经济发展区域；另一方面又具有处于全国最前列的发展水平，无疑值得研究和探讨。

关于宋代四川地区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诸多学者围绕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发展，对其货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迄于目前，这一课题仍主要局限于货币方面，而缺乏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针对这种情况，本书拟逐一分析论述宋代四川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它的商品、市场、货币、商人问题，以及四川与中原内地和民族地区的输出贸易，并进而对其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作出一个基本估价，以期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

为有助于问题探讨的深入，同时也为了避免某些不必要的重复，本书多采用专题性研究，着重对目前尚未涉及以及存有商讨余地的问题进行探讨，而不拘于内容上的面面俱到。当然，这也引起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主要是同一资料的重复运用。

因相关资料十分有限，更重要的则是本人水平所限，故虽克尽绵薄，但对许多问题的论述，终究不能尽如人意。并且，其中疏误之处也定当不少，恳请读者教正！

^①(日)藤田义信：《宋代商业史》第139页。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	(1)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1)
第二节 交通网络系统的形成	(4)
第三节 护商政策和商业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	(12)
第二章 商品与市场	(16)
第一节 商 品	(16)
一、商品化进程及特征	(16)
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与商品流通	(21)
三、优势手工业的发展与商品流通	(30)
第二节 市 场	(48)
一、市场类型概说	(48)
二、市场功能及结构	(58)
三、市场发展趋向	(66)
第三章 货币与商人	(71)
第一节 货 币	(71)
一、铁钱区的形成及长期存在的原因	(71)
二、交子的产生及其流通	(83)
第二节 商 人	(94)
一、商人的产生及类别	(94)
二、商人资本的流向	(100)
三、商人的活动及历史作用	(103)
第四章 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	(107)

第一节	四川与东南地区的贸易	(109)
一、	商品贸易的考察	(109)
二、	贸易的方式	(116)
三、	贸易发展的原因	(119)
四、	贸易的历史作用	(124)
第二节	四川与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贸易	(126)
一、	商品贸易的考察	(126)
二、	贸易的不平衡与官府的调节措施	(136)
三、	政府对贸易的控制及影响	(141)
四、	贸易的历史作用	(143)
第三节	四川与汴京的贸易	(148)
一、	商品贸易的考察	(148)
二、	荆南及陕西在贸易中的特殊地位	(154)
三、	贸易的特点	(155)
四、	贸易的历史作用	(157)
第五章	四川与民族地区的贸易	(160)
第一节	四川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	(162)
一、	商品贸易的考察	(162)
二、	贸易与西南民族政策	(178)
三、	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	(182)
四、	贸易的历史作用	(184)
第二节	四川与吐蕃族地区的贸易	(189)
一、	商品贸易的考察	(189)
二、	宋廷对贸易的管理	(196)
三、	贸易所贯穿的民族政策	(199)
四、	贸易的历史作用	(202)
第六章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析	(205)
第一节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估价	(205)

一、从商业的地位及作用看商品经济的 发展水平	(205)
二、从北宋四川商税看商品经济的 发展水平	(209)
第二节 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	(229)
一、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229)
二、南宋商品经济的衰退	(233)
附 录	(243)
一、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	(243)
二、宋代四川茶法考略	(262)
后 记	(273)

第一章 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

宋代，四川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条件。一方面，它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以及交通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宋王朝长时间在这一地区推行商业自由贸易政策和实施了一系列护商政策。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和发展起来。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宋人欧阳修说：“商达货以迁有无”^①。石介说：“都市待百货而后盈”^②。毫无疑问，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货”的多少。

所谓“货”，具体而言就是商品。据粗略统计，宋代四川地区的商品有茶、盐、酒、布帛、米谷、药物、纸墨、书籍等几十类数百种。从它们的来源看，其中有的来自农业生产部门，有的则来自手工业生产部门。

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川西成都平原、川北汉中盆地以及川东遂宁河谷最为显著。在这些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水平都处于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土地开发利用率较高。据宋人杨天惠说，宋王朝统一四川后，“升平既久，生齿渐繁，人弃刀剑，市钱博相与

^① 《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25，《南省试策第一题》。

^② 石介：《石徂徕集》卷上，《代张颉推官上铨主书》。

垦田修穡事，以故曩时瓴甃之区，并在草泽者，类渐就开凿”^①。一时之间，就形成了“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垦”^②的局面；其二，耕作技术和水平较高。南宋初年，蜀人高斯得为宁国府知府，曾向当地百姓讲述“蜀人治田之事”：“方春耕作将兴，父老集子弟而教之曰：田事起矣，一年之命，系于此时；其毋博饮，毋讼诈，毋嬉游，毋争斗，一意于耕。父老之教既先，子弟之听复谨，莫不尽力以布种。四月草生，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击鼓以为之节，怠者有罚，趋者有赏。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汤，薅耨之苦尤甚，农之就功尤力。人事勤尽如此，故其熟也常倍”^③。虽然这种耕作水平比之江浙地区要略为逊色，但它却已达到较高程度；其三，稻麦二作制普遍推广，“四川田土，无不种麦”^④。小麦的普遍种植，改变了过去单一种植水稻的历史，从而使得土地利用及粮食产量均大幅度提高；其四，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当时，举凡茶叶、蚕桑、药材、花木、水果都已开始专业种植（后详）；其五，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由于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变化，粮食产量因而大为增加。对此，四川人苏轼曾有“千人耕种万人食”^⑤的诗句加以概括描述。这其中虽不无文人的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与上述平原、河谷地区相比，其他广大的丘陵和山区，“土旷人稀”^⑥，土地开发利用率极低；“刀耕火种”^⑦，耕作技术极为原

① 杨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记》，《宋代蜀文辑存》卷26。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下称《长编拾补》）卷14，绍圣四年闰二月条。

③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④ 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

⑤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1，《和子由蚕市》。

⑥ 周辉：《清波别志》卷上。

⑦ 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16，《劳畲耕并序》。

始和落后；“最号穷陋”^①，粮食产量极低，从而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生产最为落后的地区。不过，由于经济作物在山区的广泛种植以及山区人民大力开垦梯田，这些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较诸以往还是有不小的进步。

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反差，无疑影响了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但是，成都平原等区域的高度发展，还是从一个极高的高度为其奠定了基础。所以，《宋史·地理志》这样评述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整体水平仍处于全国前列。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极为迅速。宋代以前，其发展多局限于纺织、盐业、冶铸、造纸等行业。入宋以后，除了这些传统行业得到较大发展外，酿酒、陶瓷、造船、印刷等一批新兴行业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多门类、多行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再者，其手工业生产的分布较广，不唯经济发达的川西地区手工业长足发展，就连相对落后的川东地区，手工业生产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在诸如食盐等部分行业，还比川西地区占有一定优势。

在向广度发展的同时，四川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在深度上也大大迈进了一步。一是各行业的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能力大为增强；二是各地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挖掘生产潜力，形成了一批在全国享有一定盛名的优势手工业。

财政赋税是国家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宋代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反映到它的财政收入上。因此，从四川地区在宋王朝财政中的地位，我们不难看到其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

宋人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货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②。大约在此前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

② 吕陶：《净德集》卷14。

后，文同也说：“惟剑南西川，原野演沃，~~戎~~庶丰夥，金缯~~纒~~繁天丽，地发装饷，日报舟浮，輦走以给中府，以贍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倚之，因以为宝藪珍藏云。”^① 有关方志更说：“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② 由此看来，宋代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确已达到较高水平。

贾大泉先生通过对宋代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的考察，认为：“就四川历史上经济发展史而论，它不但远胜前代，而且超过了后来的元代和明末清初。因此，可以说宋代的四川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③ 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肯定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已超过了后来的元代和明末清初，但却极为赞同四川经济发展远胜前代的说法。四川经济的这样一种发展，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交通网络系统的形成

宋代，宋廷对于四川地区的交通问题十分重视。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即“命川陕诸州长吏、通判并兼桥道事”^④，飭令各地大力兴修交通路道。之后，川峡四路修路成风，甚而出现了“多建议修路以邀恩赏”的情况，以致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廷不得不“诏利州路转运司：自今命官、使臣欲修易栈阁者，须述经久利害，待报，无得擅行”^⑤，借以纠正修路中所存在的诸如道路质量较差等问题。

① 文同：《丹渊集》卷23，《成都府运判厅燕思堂记》。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6。

③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第4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8，乾德五年十二月条。

⑤ 《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条。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四川地区的交通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对外交通方面，则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辐射四周的交通系统。

就辐射北部地区的交通而言，千里栈道仍为四川与内地联系的重要陆上通道。这条通道以汉中地区为中点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主要有四条：一条由子午关经子午谷达汉中，“承平时，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①，是为子午道；一条由骆谷至傥谷，是为傥骆道；一条由斜谷至褒城，兴元府“土民每春出游，常苦秦陇悉少从褒斜间道往来剽窃”^②，是为褒斜道；一条由大散关经凤州至褒城，其中凤州入两当至金牛驿一段，“计四百九里，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不为艰苦。……今茶纲见行旧路，商客皆由此出”^③，是为陈仓道。南段主要有两条：一条由汉中经利州、剑州、绵州、汉州至成都，是为南栈道，又名官道；一条由汉中经米仓山至东川重镇梓州，是为米仓道。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九月，“上封者言：‘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盖自利州入阆州，由葭萌寨，并有私路入川。乞今葭萌寨依剑州置关，委本寨使臣，验认公凭放往来。’从之”^④。显然，两道均为重要交通路线。

上述千里栈道南北段相连，再向外延伸，可远至北宋首都汴京。当时，四川地区的各种物资经由此道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汴京，它是四川重要的陆上“纲运”路线。

与千里栈道相对应，长江水路则是四川重要的水上“纲运”路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卷62，绍兴三年正月条。

② 文同：《丹渊集》附《宋故尚书司封员外郎充秘阁校理新知湖州文公墓志铭》。

③ 《宋会要·方域》10之3至4。

④ 《宋会要·方域》12之5；《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九月条。

线，也是四川地区向东辐射的交通线。史载：“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①。为保证纲运的畅达，乾德三年（965年），宋廷在自嘉州至荆南的沿江地区，均“分署驿所”。至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则革除原先“籍里民补牙校部舟运”的积弊，“择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十二艘为一纲，以二人主之，三岁一代”^②。于是，“顺流而下，委输之利，通西蜀之宝货，传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挂则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里，为富国之资，助经邦之略”^③，长江水路成了四川与内地联系的又一交通要道。

此外，四川与西南各民族地区以及吐蕃族地区的交通也较为发达。这是四川地区向南和向西分别辐射的交通线。

西南民族地区，民族众多，这些民族与四川多有交通往还。宋人吴昌裔说：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蛮，次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大渡河之于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卢（蛮），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马湖大江蛮每借两林[“林”字原夺，今以意补]、虚恨、邛部川路贩马于青羌，弥羌，时有好马至叙州互市，皆得之西方。马湖江自叙州入江至开边寨，右去为大江蛮，左去为小江蛮，小江即乌蒙部落也。乌蒙疆界稍大于诸蛮，可为云南之次，所有小地随小江而上绕出大江、两林、虚恨

①《宋史》卷175，《食货上三》。

②《长编》卷54，咸平六年四月条。

③苏辙：《新修江表图记》，《全蜀艺文志》卷37上。

之后，与小云南相接。乌蛮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其他皆与属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峨眉县中镇[“镇”字原夺，今以意补]寨。由夷都可通犍为县沐川寨。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由阿永河可通泸水之江门寨。此皆通行往来之路。^①

由邛部川通黎州的路线，向南延伸就是入云南的一条大道。该线以黎州为起点，南过大渡河，经邛部川部落，达嵩州，由此再建昌城、云南，抵达苴咩城^②。用今天的地名来说，就是从今四川汉源一带出发，过大渡河，经四川西昌、云南祥云等地，抵达大理。

由虚恨蛮通峨眉县的路线，也是入云南的一条通道。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四川嘉州人杨佐应募入云南买马，就取道该线。具体途程是：从峨眉县出发，达铜山寨，经虚恨、束密，抵苴咩城^③。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这条道路乃是由今四川峨眉县，经峨边县，再经凉山中部及宁南、会理，渡金沙江至云南姚安，最后抵达大理^④。

由夷都通犍为县沐川寨一线，也可南入云南。据冯汉鏞先生考证，该线乃是由清江河谷往上行，经马边、大凉山、昭觉等地至西昌，再由西昌抵达大理^⑤。

据宋人吕陶说，北宋时，“清井监有言云南鬼主将请道来贡”。^⑥由此看来，由大江蛮通宣化县崖门和叙州开边寨，由吕

① 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宋代蜀文辑存》卷85。

② 《宋史》卷496，《蛮夷四》。

③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条。

④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油印本）第一辑，《云南买马记》概说。

⑤ 冯汉鏞：《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载《文史》第十四辑。

⑥ 吕陶：《净德集》卷21。

告通长宁军，由阿永河通泸州江门寨的路线向南延伸可达云南。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戎州（叙州）开边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五十里至阿傍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瑜官川，又经薄季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戡溪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镇，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宁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百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即该路由宜宾出发，渡金沙江沿河谷上行，经庆符县境、石门、盐津、豆沙关、大关、鲁甸、曲靖、昆明、安宁、凤仪、祥云等地而达大理。

通过对上述几条交通线的考察，即可看出，吴昌裔所列举的数条交通线均是西川通云南的道路。而对东川通云南以及四川通贵州乃至两广的交通线则未言及。这里略作补充。

东川通云南的交通线至迟在唐代已经开辟。唐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北向请命”，“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使”。其中，“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①，此条即东川通云南的交通线。不过，唐代人也只知有这条路线而已，对其具体途程则“未谙委”。迄今也无人对此作出考订。据笔者考证，此线乃广西通云南的交通线的分支线，其具体途程为：黔州（治今四川彭水）——涪州（贵州瓮安）——牂牁（贵州贵阳）——罗殿国（贵州安顺至贞丰一带）——七源州（广西凌云东南五十里）——自杞国（贵州兴义）——石城郡（云南曲靖）——善阐府（昆明）——苴咩城（大理）^②。

①樊绰：《蛮书·附录》。

②详见拙文《唐代由四川东部通云南的交通路线考》，载《史与志》，1990年第3期。

由四川通贵州的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陆路，开通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是年，“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①，即以四川重庆为起点，经贵州贵阳、贞丰，达广西南宁；另一条为牂牁江水路。按，此线在汉代即已有明确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汉建元六年（前136），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数百步，足以行船”。据方国瑜先生考证，牂牁江乃今天之北盘江^②。由此看来，这条水路是顺北盘江行进，再转入红水河，经浔江、西江入广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这些交通线，也是四川通往国外的重要通道。其通贵州的交通线，延至两广，可转道东南亚和南洋。其通云南的交通线，达大理后，向外延伸，“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③，即可通越南、缅甸、印度等国。

吐蕃族地区，地域范围较广。宋人邵伯温说：“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滇~~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④。当时，四川西部缘边各州，均有通往吐蕃族地区的交通线。

黎州：南宋时期，范成大除四川制置使，当时，吐蕃青羌部落两次进犯黎州，范成大疏言，“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⑤。由此可见，黎州通吐蕃的道路甚多，不过，可能因这些道路多为“狭邪之径”，当时人疏于记载，以至我们今天无法详

① 《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

②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第170—171页。

③ 《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条。

④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3。

⑤ 《宋史》卷386，《范成大传》。